

第6卷第4期 2013年10月

Vol. 6, No. 4, October, 2013

国际高等教育

人才流失与人才交流

“人才流失”还是“人才交流”？ 121

研究合作和国际迁移 124

国际化：趋势与批判

国际化的虚伪光环 126

龙的交易：中非教育合作 128

外国文凭评估服务的欺诈行为 130

境外教育活动的财务管理 132

大学排名与启示

全球排名对拉美大学不公平吗？ 135

追求教学卓越和研究卓越的启示 137

印度的高等教育

印度：高等教育物有所值吗？ 139

印度的教育国际化战略 141

英国的现在与未来

英格兰的教育处于困境中？ 144

2025年英国的高等教育将是什么模样？ 146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维持学生贷款体制的挑战：哥伦比亚和智利的发展 148

美国工程博士招生 151

新书快递 153

“人才流失”还是“人才交流”？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发达国家正为人才短缺忧心忡忡，特别是经济体高端领域的人才尤为匮乏。造成人才短缺的原因众多，例如，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人口悬崖”造成大学适龄青年数量的急剧下降（尤其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简称 STEM]的入学学生人数过少）、入学率趋于平稳以及学业完成率低的现象。这些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那就是增加国际学生“保留率” (stay rates) 的呼声越来越大，即说服国际学生（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完成学业之后留下来。简言之，发达国家正在抢夺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或者说是在抢夺任何可能被诱惑的合格人才。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人才流失已经是学术界的常态，但是该现象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愈发突出。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而言，他们面临在全球知识经济中落败的危险，这会让他们在未来一蹶不振。

当前的现实

在全球化时代，把“增加保留率”称为“鼓励人才流失的专门政策”也许不算过于夸张。“保留率”已经相当高了。例如，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国和印度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80%留在了美国。毫不夸张地说，硅谷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印度的人才流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最近对博士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特别是 STEM）大部分都打算留在美国，加入学术劳动力大军。尽管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数据很难获得，但无疑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然而，近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得以改善，而一些发达国家却仍深陷在衰退的泥潭中，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人才的回国率在逐渐增加。

穷国补贴富国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正在为富裕国家的学术系统做着巨大贡献。国际学生留学并在毕业后留下来工作，都为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经济体做出了巨大贡献。2011年的数据表明，在美国学习的76.4万名国际学生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超过220亿美元。其它主要的留学生接受国也有类似的统计数据。的确，澳大利亚和英国都明确提出了从国际学生那里增加收入的国家政策，前者每年从国际学生那里挣得170亿美元，后者每年可挣得210亿美元。

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士毕业生为发达国家带来的福利，这些博士毕业生通常在学成后留在相对富裕的国家从事学术职业。以下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人才输出国”印度和中国的例子。应该注意的是，由于细节不可获得且数据点

多变, 这些统计数据只是暗示性的。2012 年有 10 万名印度学生在美国留学, 大多数攻读本科以上的学位并且在拿到学位后留在了美国, 许多人在当地就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的粗略估计, 为了将一个学生从小学培养到本科, 印度纳税人要支付 7 600 美元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预计, 印度家庭为了一个孩子的教育也要投入数额相当的费用 (约为 15 000 美元), 特别是目前已有许多有能力进入海外大学就学的年轻人, 在一些印度的私立英语学校接受教育。因此, 通过培养这 10 万名本科生, 印度对美国的教育投资就达到每年约 15 亿美元。中国的数字很可能会更高。尽管教育的公共支出数据难以获得, 但有研究显示, 在中国将一个孩子培养至本科毕业, 一个家庭平均需要花费 3 9000 美元 (以购买力平价换算)。2012 年, 中国有 19.4 万名学生前往美国求学。可以算出, 中国家庭为此向美国投资了 76 亿美元。尽管拿不到相关数字, 但中国政府肯定也为之投入了大量额外经费。估算各种留学生输出国 (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对留学生接受国的教育贡献似乎是可能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留学生都会在完成学业后留在留学接受国, 但其总数仍很可观。除了直接成本,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为这些接受国贡献了大量知识资本。同时, 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包括优秀的科研教学人才, 以及那些可能在海外学习体验和大学管理实践中培养出的创新思想。

发达国家的战略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 和纳奈

特·里普米斯特 (Nannette Ripmeester) 精妙地总结了一些旨在通过改变移民政策、提供奖学金、促进大学和招聘方的联系等措施增加“保留率”的政策 (请见《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2013 年 2 月 17 日的报道)。在欧洲和北美, 人们都赞同: 吸引他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专业人才来接受教育、让他们留下来并加入当地劳动力大军的新措施是个不错的想法。正在实施的政策包括: 努力放宽签证规定, 开放雇用机会, 允许研究生工作、简化学位认定, 改善大学、政府和工业界的合作以及许多其他措施等。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最近收紧了移民限制, 但他们正在重新考量自己的政策。美国国家科学院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和许多大学都主张放开签证体制, 从而让外国毕业生更容易留在美国工作。强调新兴国家发展教育必要性的“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和那些吸引发展中国家优秀人才的政策之间, 绝对没人意识到存在任何矛盾。

南非和博茨瓦纳等非洲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先进的高等教育体制, 并且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工资待遇, 他们也在从非洲以外的国家招揽人才。此外, 主要的“学术强国”之间也有学术人才流失的情况。德国非常努力地试图吸引在美国工作的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回德国, 但收效甚微。美国具有更稳定的学术职业框架和较高的工资, 这使其具备较强的吸引力。美国的大学也在试图留下最优秀的国际毕业生, 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全球化世界的复杂性

尽管地理位置依然重要, 且世界的学术卓越和权力版图也并不是扁平的, 但是全球

化的确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学术系统。互联网让交流和合作更便捷。不同国家学者之间开展的合作研究和成果发表也已快速增长。远程教育、双学位项目以及国际分校等形式都显示了学术全球化的另一面。然而，这些都无法弥补人才的损失。

中国有大量的学者在海外工作，政府也已建立了一批项目以期吸引华裔研究人员回国工作。关键领域的学者可以获得联合聘用，这样一来中国的大学也可以受益于那些希望在国外保留职位的顶尖学者。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也在试图通过鼓励联合研究计划、吸引投资、资助学术组织等方式来吸引海外学术人才。那些成功的项目至少已经可以保障当地的顶尖人才能够受益于国外同僚的专业知识。韩国、土耳其、苏格兰等国家和地区也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相关项目。

然而，在以上所有案例中，全球那些主要的学术中心显然仍占据优势。同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与互联网交流、学术休假、夏季出国相比，能够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更具吸引力。稳定的学术职业、颇具吸引力的工资、学术自由、与前沿科学和思想接触，这些都是巨大吸引力的来源。那些试图

召回学者或者限制学者流动的项目几乎没有非常成功的案例。事实是，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能够提供那些顶级学者所期望的学术文化和学术设施（包括学术自由、无限制的信息使用和实验室）的时候，这些大学才能吸引顶尖学术人才留下来。不过，发达国家的那些人才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吸引人才毫无用处。

学术正义？

“学术强国”有责任发展学术体制吗？当下的讨论并没有意识到需要有人承担责任，以鼓励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博士毕业生回国、建设大学并改善新兴学术系统的质量。唯一的关注点在于提高“保留率”和放松移民规定，以帮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最大限度地留在留学接受国。在“千年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发达国家难道不应该至少补偿发展中国家为教育这些不回国的年轻人所产生的费用吗？至少有许多方法可以改善这种情况，例如，联合博士学位课程，可以让发展中国家的博士生留学国外完成部分博士课程，即在与母校保持联系的同时培养提高其研究能力。那样，发展中国家至少不会直接补贴发达国家的学术系统了。

研究合作和国际迁移

Gali Halevi、Henk F. Moed

Gali Halevi: 美国纽约爱思唯尔集团 (Elsevier) 情报计量学研究小组成员

电子邮箱: g.halevi@elsevier.com

Henk F. Moed: 荷兰阿姆斯特丹爱思唯尔情报计量学研究小组成员

电子邮箱: h.moed@elsevier.com

本研究比较了国与国之间科学家移民迁移与论文合作的不同趋势。合作论文分析长期被用于追踪国内和国际科学网络的形成。然而,最近越来越多人的兴趣点转移到了通过追踪和分析作者的附属机构来跟踪研究人员在国与国之间的地理迁移。通过分析一篇特定论文或大量文章作者的地理位置,就能辨认出国际合作论文和合作网络。与合作论文相反,人才迁移不仅影响到科研合作的形成,还会影响到一国的社会和经济构造。由于科学界的优势和不足、一个国家受益或蒙受人才流失,皆取决于人才迁移问题,因此人才迁移的趋势可以潜在地服务于政策制定者和专业负责人。

人才迁移和合作论文的驱动力

我们近期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数据库,收录了超过2万个同行评议期刊来源。我们利用它分析了17个国家的论文合作类型和科研人才迁移的情况,这些国家是埃及、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葡萄牙、德国、意大利、荷兰、英国、巴西、中国、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泰国。通过分析2011年的论文情况和2001~2010年间开始其学术职业的作者情况,研究能够追踪到人才国际迁移的优势。

研究发现了论文合作和人才迁移模式之

间的不同。很明显,人才的国际迁移更多受到迁移国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地理位置是否邻近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比论文合作本身更具吸引力。此外,政治的紧张局势对人才迁移的作用并没有其对论文合作的作用大。伊朗和美国、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低论文合作率和高人才迁移率可以表明这一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可佐证这一点。

美国和中国的人才迁移类型属于两种有趣类型的独特案例。美国的论文作者不像欧洲研究大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的论文作者迁移那么频繁。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的科研体量大、卓越研究机构多,足以让研究人员从一个研究所流动到另一个研究所而不用离开美国。此外,我们的分析表明,与论文合作的程度相比,美国许多相对活跃的年轻研究人员此前在印度和伊朗等地也都有很活跃的表现。

永久性迁移和临时性迁移

分析的另一个焦点是基于那些留在自己国家的作者比例、永久性迁移和临时性迁移人数等。留在自己国家的作者比例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中国。来自德国和荷兰的作者永久性迁移比例最低,其次是美国和意大利。最不可能发生永久性迁移的是中国的作者,这可能源于中国科学家所拥有的研究

资源，而并非他们的专业知识。因此，中国科学家可能会流向其他国家，在获取了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之后再回国实践以及发展他们的职业生涯。研究还发现，出国之后又回国的作者比其它类别的作者比例都要低。

将永久性迁移的作者和那些临时性迁移后返回故土的作者比例进行比较后，人才流失的国家和处于基础设施发展期的国家就清晰的呈现了出来。伊朗、泰国、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似乎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出国后又回国。这种人才迁移类型支撑了国际专业人才水平的提升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表明人才交流的日益频繁。而在另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他们有更多的研究人员永久性迁移到别国。居中的是中国、巴西、澳大利亚，他们的永久性迁移和临时性迁移比例持平。

对科学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分析不仅追踪了现有的趋势，还能潜在地被用于评估人才迁移和科研合作类型对研究绩效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在国际间流动的研究人员提高研究绩效的程度。几年

前，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做过一个有关研究人员绩效的案例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在荷兰拿到博士学位后前往国外顶尖大学进行博士后训练的人比那些留在荷兰的人表现更好。

附属机构指标引入后可以追踪论文合作的类型并厘清国内和国际科研网络的形成机制。运用附属机构指标进行的类似研究已经表明，它们可以被用于追踪科学家在国与国之间真实的物理迁移，无论是永久性的还是临时性的。这种研究方法让国家政策制定者们得以跟踪那些在一国开始学术生涯后出国继续其学术职业发展的研究人员。这一信息可以为那些旨在吸引研究人员回国的项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此一来，研究人员还可以围绕科研热点追踪人才流动。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发现神经科学的科学家正在迁出，就能实施投资决策以留住人才、避免人才流失。这种分析还能够预测世界各地卓越研究中心的形成。

注：全文参见 <http://arxiv.org/ftp/arxiv/papers/1212/1212.5194.pdf>。

国际化的虚伪光环

Jenny J. Lee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图森校区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电子邮箱: jennylee@email.arizona.edu

随着世界各国及其大学纷纷制定战略参与如今全球社会的竞争中去, 国际化已经成为前沿议题。国际化可以被类比为针对国际学生、学者、专业以及将国外的人和活动与大学建立起关系的军备竞赛。尽管人们对国际化做出了巨大努力, 但一旦活动启动, 对投资质量和教育回报的关注却没那么多。国际化的这一影响无疑忽略了移民和交流中“人”的因素, 很多文章将之视为全球的严重不平等。简言之, 不谨慎考虑预期目标和意外后果就盲目推进国际化存在风险。

对国际学生和学者体验保持谨慎和关注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内省力, 从而改善国际化的效益, 朝预期目标迈进。针对国际学者和学生的研究并不充分, 而针对学生体验的两个研究案例分析能为“应该怎样准确评估和实践国际化”这个问题带来启示。

科研博士后劳动力

国际博士后是科研生产的一个基本群体, 但他们常常被忽视。在美国和英国, 博士后大量集中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在专业人才短缺的背景下, 他们服务于国家的科学知识创造。同时, 来自国外的博士后人才资源非常丰富, 因为国际学者倾向于在美国和西欧国家那些排名最高的全球大学中谋求职位。

尽管所有的博士后都多少有成为大学专任教师的愿望, 但国际博士后中真正当上专

任教师的则为数不多。他们主要有两种就业取向, 分别是理论型(美国和欧洲)和技术型(亚洲), 主要取决于院系管理者的偏好。这些偏好继而转变成不同程度的工作责任, 并最终变成职业道路, 比如签订了临时合同的实验室主管, 或者是教师编制中科研教师。基于本研究的发现, 一些特定群体(如亚裔)常常被安排了一些很难使其获得专任教师职位的任务。教师管理者的决定可能来源于其对文化和国籍的偏见。

身处今天的全球知识社会, 效率原则意味着, 相比于一个全职终身教授, 一些临时研究人员或短期研究人员是科学知识生产更好的财务投资对象。因此, “终身博士后”(postdocs for life) 这个名词也愈发普遍, 因为晋升和永久性工作的机会非常有限。然而, 当考虑到这些活动是否是“国际化”的一部分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表面上看, 雇佣国际学者似乎符合国际化标准。但是更本质地看, 对发展中国家学者的潜在剥削直接违背了国际化正直的意愿。

来自国外的学生运动员

第二个例子是国际学生运动员, 美国大量招收他们以帮助大学建立运动声誉。和国际博士后一样, 招收国际学生运动员也是为了让大学提升声誉, 不仅限于国内运动人才的供应。针对非洲田径运动员的职业发展轨迹的研究相对较多。社交孤立、口头侮辱和

骚扰的问题都被指认出来，与此前对其它国际学生群体的研究结果非常相似。在所有针对非洲学生运动员的错误观点中，最广为流传的一个是，这些学生运动员未来会优先选择体育运动而不是学术职业道路。结果，许多人被安置到对学术要求较少的专业以适应他们的训练和比赛，他们毕业所获得的学位，与其回到祖国所从事的事业几乎无关。

在美国，一个受到重视的运动专业能获得来自公司赞助商、捐赠者、门票销售商等数千万美元的投入。为了保持和提高团队的竞争力，从国外招收运动员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些国际学生可以被用于展示大学的国际化努力，这是一项额外的好处。这些学生也能够获得比国内更高的奖学金，还有大学学习机会。这种双赢局面对双方都很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更谨慎些就能看出问题。虽然大学花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招收到这些学生，但是这些运动员的学习经历被忽视了。针对这些学生的职业发展轨迹也未被关注，特别是考虑到，即使没有接受大学教育，顶尖运动员也会寻求职业运动员生涯。

社会和教育责任

总之，将国际化视为天生就好的观点是幼稚而不负责任的。国际化不仅仅是一系列看得见的活动，还是社会责任和教育责任。正如此前的例子表现出来的那样，国际化的努力不会自动改善教育机会和教育体验，更不必说改善相关国家的外交关系。

国际化潜在地反映出接受国的主要利

益，而不是相互协作和文化交流的精神。在高等教育背景下，教师和行政管理者不应该受制于财务因素做规划，虽然这已经是常态。国际化一旦启动，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接受国或者接受学生的学校，而不是学生本人。当国际学者和学生表示，接收他们的学校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自己受到歧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是骚扰的时候，招收他们的单位应该着手解决问题，而不要让受害者自己想办法。

研究发现，歧视常常源于我们国内的学生甚至老师，讽刺的是他们就出现在教育场所，如课堂上。被报道的事件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教育系统在教育本国公民国际化价值观上的失败，也表明本国公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能从国际学生和学者身上受益。

许多国内的学生付不起留学费用，但可以在大学中获得国际体验。但国际学生最失望的地方就是缺乏与所在国学生的交流互动。虽然大学举办很多大学活动以促进学生交流，但当地学生的兴趣有限、参与度不高。高等教育机构可以通过对本国学生的国际化价值观和能力的教育来推进国际化，例如能与有外国口音的人有效交流、掌握国外多元文化知识、与国外建立关系网络，这对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取得成功十分重要。

接收国和大学需要避免为了国际声誉和经济收入而剥削国际学生和学者。尽管国际化是今天学术版图的一部分，但我们仍然要考虑应该如何付诸实践。

中非教育合作

Milton O. Obamba

肯尼亚埃尔多雷特非洲教育国际化网络 (African Network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副研究员

电子邮箱: M.O.Obamba@Leedsmet.ac.uk

中国和非洲有很深厚的双边合作传统。2000年建立的“中非合作论坛”(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有力地促进了中非合作。该论坛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为了加强中国和50个非洲国家的双边合作而共同建立的政府间机构。更准确的说,在这个多边互动加深的时代,“中非合作论坛”的出现加强了中非关系的制度化,不过批评之声也同时多了起来。“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之后,贸易规模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提高到2012年的1600亿美元。类似的,中国对非的官方援助也从2006年的5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200亿美元。简言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在加深,覆盖了战略、经济和社会政治各个领域。本文聚焦于中非在教育领域合作的发展、特征和范围,分析了中国政府和“中非合作论坛”的政策文件,旨在更系统地描绘中国与非洲的双边教育合作。

人力资源和学术流动

中非教育合作最早的形式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规模较小、相对分散的交换项目,当时非洲学生到中国来,中国教师到非洲去。中国政府为此向非洲学生提供了少量奖学金。1970年代,中国为非洲多个领域的教师开办了短期培训项目。中国在首个“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2000年)中再次许下了增加政府奖学金数量以及向非洲派遣中

国教师的承诺。该行动计划还建立了意义深远的“非洲人力资源发展基金”(the Africa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Fund),旨在为培养非洲教师提供一个协调机制。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奖学金和教师能力培训机会一直在不断增加。例如,奖学金从2003年的2000个名额增加到2012年的6000个名额。最近,中国在非洲的新一轮行动计划让人们们对非洲50国教师培训机会招收标准的透明度产生顾虑。考虑到非洲大陆的广袤和多元,中国与全非洲的间接合作也引来一些针对中国优先顺序和合作效率的批评。

能力建设

几十年来,无论是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建立前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都是中国对非工作日程上的重点。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在非洲建立100所农村学校;第四届峰会又提出,建立50所中非友谊学校,并为从中国返回非洲的非洲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设施。中国在非洲的一些主要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大学(the Ethio-China Polytechnic in Addis Ababa)和马拉维科技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被批评为一种允许非洲精英统治者腐败和政治赞助的方式,并不是真正为帮助非洲人民可

持续发展而进行的。然而，中国对非的基础设施资助对非洲国家来说很重要，因为传统的西方捐赠者都不再支持这种行动了，而且非洲政府也正面临严重的财政紧缩。

学术合作

尽管相互的学术流动已经成为 1950 年以来中非教育合作的重要特点，但大学之间却没有直接的合作机会。这是因为中非合作主要是通过政府推动的，其中没有非政府（non-state）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因此，校际间合作才刚刚开始，是具有开创性的发展。2006 年的“北京行动计划”（The 2006 Beijing Action Plan）首次开始通过建立孔子学院的方式发展校级合作，尽管这仍然主要是政府层面的组织（是展现中国全球“软实力”的一部分）。2009 年建立的“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the 20+20 cooperation program）也是一项重要项目。该项目旨在 20 所中国高校和 20 所非洲高校之间建立结构性的一对一合作关系，以促进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的发展合作

2009 年和 2012 年分别签署的第四个和第五个《“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都是中非合作特点、范围和话语的剧烈转折。这些蓝图表明了知识、科技及其与非洲可持续发展和扶贫之间的联系。在此势头下，中国承诺为非洲提供 100 个博士后奖学金名额，并建立 100 个合作研究示范项目。这些计划建立了三个对新兴的中非合作范式至关重要的项目：“中非技术合作项目”（China-Africa

Technology Partnership Program）、“中非研究和交换项目”（China-Africa Research and Exchange Program）以及“中非智库论坛”（the China-Africa Think Tank Forum）。所有这些旗舰型合作项目大体上都聚焦于合作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加强非洲科技发展、政策制定、管理和技术转移的措施。新的技术合作聚焦于那些对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领域，包括卫生保健、环境、农业、再生能源和水资源发展等。

这些发展轨迹标志着中国在扶贫和可持续发展上的转变，不再走传统的大基础设施项目路线。“中非智库论坛”表明其新的焦点是培养科学实力——这是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中加强中非合作的知识基础和稳固性的前提。然而，中国在中非合作中日益激增的主导性也受到广泛质疑，因为会增加非洲对其的依赖性。

结语

中国对非教育发展的援助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现在援助范围和结构已经相当多元化和制度化。最近，在加强科学技术能力和将知识直接应用于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水平上有了显著和前所未有的转变。这表明，中国的发展援助对非洲达成千禧年发展目标可能是一股正能量。然而，如果中国将当前南北合作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模式复制过来，那么这些潜在的成果也可能受到严重的威胁或损害。中非发展合作应该引入双方的非政府组织，如此才能为中非发展计划的实施提供充足的能力和协同效应。

国外学历认证机构的欺诈行为

George D. Gollin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物理系教授

电子邮箱: g-gollin@illinois.edu

一位年轻的非洲医师在非洲待了一年之后想去希腊找工作。于是,他请了一家学历认证机构为其担保医学学位的合法性,并将结论报告发给了希腊。该机构保证“公正诚实的评估”,并声明自己“反对通过专业技术和评估进行学位欺诈”,认为“申请者的学历等价于……美国经过地区认证的高等院校所颁发的医学博士学位”。

然而,该报告却未提及:学历认证机构的所有者曾从事学位欺诈,并因为在欧洲开办文凭工厂 (diploma mills) 被处罚了15000欧元。这一起医学学位欺诈行为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个文凭工厂,该窝点也曾经试图卖给笔者一个胸外科博士学位。然而,我是个物理学家,不是个医师。

另一个学历认证机构收了北美文凭工厂的钱,帮助它伪装成一个受到认证的非洲院校,但其本质是一个美国的违法公司。第三个学历认证机构雇佣了一个有争议的员工,并冠之以两个文凭工厂的“副校长”和“院长”头衔。

在高等教育界存在许多合法的学历认证机构,但也有很多违法机构存在。

国外的学历认证服务

国际高等教育的快速变化使跨境学习的学生进行学分转换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在国内对国外学位项目进行专业评估耗费巨大,大学和雇主自然要寻求外部专家的分析,例

如美国大学注册和招生办公室协会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 的国际教育服务部,或者是美国国家文凭评估服务协会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edential Evaluation Services)。欧洲信息中心网络 (European Network of Information Centers) 和欧盟国家学术认证信息中心 (National Academic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Centers) 也提供可信赖的学历认证服务。

不幸的是,美国并没有对数百个外国学历认证服务机构进行规范的监管。有时甚至连专业协会的成员也不靠谱,如2009年,一个与臭名昭著的“圣里吉斯大学” (St. Regis University) 合作的学历认证机构邀请了一些合法的评估商加入一个相当知名的文凭工厂,帮助“小型的独立机构联合起来获得认可”。大多数协会成员都与那些已知的文凭工厂合作。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教育者协会,它提醒道,成为该协会会员“并不意味着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已经评估或支持其项目或活动,该协会会员资格并不代表什么”。美国国家学历认证服务协会的成员也坚持标准,该组织目前只有21个成员。

一个公司的人事办公室怎样才能分辨这些合法和非法的外国文凭服务机构呢?这些不合法机构往往剽窃美国国外文凭服务

(Foreign Credentials Service of America), 一年后又因被起诉欺诈而突然关闭。

信息匮乏助力欺诈

要找到与一所学校的学位授予权相关的有用信息越来越难。有时还很微妙：在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 (the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有一个准确的认证专业和大学数据库，但美国的学位授予权却由各州授予，而不是联邦授予。合法但不寻求认证的学校并不在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的数据库中。

有关一个国家大学的信息有时是不完整的、不可获得的或不可信的。利比里亚内战结束后，该国获得认证的大学名单只在美国的利比里亚大使馆网站上公布。但是大使馆的主管和副主管都收受了美国文凭工厂的贿赂，并交给他们网站的控制权。“被认证的”院校名单中文凭工厂赫然在列，直到一位新的大使上任才将其从名单中撤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的“高校认证入口” (Portal to Recognize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尚不完整 (只有三个非洲国家进入名单)。同时，由美国大学注册和招生办公室协会掌管的“全球教育电子数据库” (Electronic Database for Global Education) 虽然有更大的覆盖面，却需要使用者付钱注册。

按照笔者的个人经验，大多数欺诈性的学历认证会歪曲学校的学位授予权。由于不存在一个人人皆可进入的、信息详尽的认证院校数据库，因此堕落的学历认证机构就能

趁机对文凭工厂的顾客们销售他们的服务。

有时候，不诚实的学历认证机构会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合法学术项目来提供大量不实信息。例如，在分析一国的三年制学位时，有人强调要使那些学位与美国的学士学位不相符就是种族歧视，他们并不为有问题的学术项目提供细致的评估。那些与文凭工厂有所联系的作者们常常给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无疑可以吸引那些寻求夸大其文凭价值的潜在顾客。

法治世界的信息传播

将高等教育欺诈者的身份和行为记录在案，并在谷歌上公开发表和索引，这些准确的信息对于文凭工厂行业是毁灭性的。圣里吉斯大学的月收入就从2004年12月的25万美元狂跌到2005年8月的几千美元，这要多亏了传媒对丑闻的曝光和互联网客观分析的联合作用。曝光学历认证机构的欺诈行为也可以是制止他们的有效工具。

政府部门可以充当记录者，收集和公布来自高等教育专家的可信信息 (包括对文凭工厂学位的正确评估)。但是，揭露这些信息对告密者有风险，他们可能面临诉讼甚至暴力威胁。几年来，俄勒冈州发布了一份有用的 (但不完全的) 文凭工厂名单。该州常常受到文凭工厂运营者和顾客的法律威胁，他们最终从互联网上撤掉了这份材料。

在国际环境尚不光明的情况下，学术文凭的市场机制失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感受到建立信息档案馆的责任，但是这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境外教育活动的财务管理

John Fielden

英国英联邦高等教育管理服务咨询公司 (the Commonwealth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ervice Consulting) 主任

电子邮箱: johnfielden1@btinternet.com

2013年4月有消息称,英国东伦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将关闭其在塞浦路斯刚刚运营了6个月、只招收了17名学生的新校区。这样一来,根据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的记录,该校会成为2010~2012年间第11个关闭境外校区的大学。这些统计强调了高等院校在境外开展活动的高风险性。不稳定的不仅仅是国际分校区;澳大利亚的跨国教育运营也发生了戏剧化的变动,从2003年的1569个项目的巅峰跌落到2009年的889个。尽管如此,境外教育在一些国家则一往无前的增长;例如,2011/12学年,英国有57.1万名国际学生在英国之外获得英国院校的学位,比两年前增加了40%。

对大学委员会和高层管理人员来说,他们亟需对潜在的境外教育活动进行严密分析。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办公室(the United Kingdom'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Unit)的一项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英国境外高等教育活动的财务指南。该研究提供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24所大学的经验教训。这些受访院校不太情愿展示过多的财务运营状况,但它们很高兴为其它院校传授经验、提出建议。报告分为三个篇章:新签订《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的院校;情况日益复杂、需

要签订法律协议的院校;进入运营阶段的院校。

签署《谅解备忘录》

签署备忘录的原意在于院校可以把握通向未来成功的钥匙。直到最近,备忘录才被一些人视为论坛的战利品或国际化的排名指标;一些人将它们视为“开启谈话的许可证”,而非严肃的合作象征。从访谈中能发现一股更战略化的趋势:主流院校现在正在开展一些辨别友好国家和适配院校的研究。在某些情况下,这适用于少数国家欲控制“深度合作伙件”数量的战略,重要的研究和教学合作伙件不用太多。这导致一个新行业的产生: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规章制度、税收体制和奖励措施、国家质量保障机构以及高等院校运营的法律要求进行广泛的尽职调查。

“价值”一词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外国投资决策中,特别适用于选择合作伙件。如果合作伙件是政府,情况就会很敏感。英国伦敦大学学院(th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和威斯敏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这两个英国院校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订了开办高等教育的合同,但这两个国家并不是民主国家。两所院校都在合同中极力维护声誉。如果合作者是商业机构,问题就更大,因为许多国家的财务和公司审计体制都不是非常透明。商业合

作伙伴常常是一些具备财产利益的大型集团，它们要么将大学视为一股商业发展的吸引力，要么将其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象征。但即使是后者，利益驱动也是在所难免，合作动机上的分歧可能成为未来发生争执的原因。

开发一个商业项目

行动的第二阶段是为董事会提出商业发展计划和相应的法律合同。在这一阶段，就价值观和动机达成一致是至关重要的，学费水平、奖学金、合理的投资回报时间都要达成初步协议。一旦技术路线上马，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达成共同语言和谅解。因为，如果合作伙伴双方的领袖人物之间存有积极的化学反应，就会在运营阶段加深非正式关系。无论法律合同如何约束，意料之外的情况或者运营中期进行内容更正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美国的受访者说：“任何不能容忍惊喜讶异、模棱两可和频繁变更的人都不应该考虑境外运营的事”。在协商阶段，也常常会出现文化差异问题。在有些国家，最后的法律合同被视为协商阶段的开始，对于“学生”、“盈余”等词汇的关键定义特别容易造成误解。“是”可能意味着“我知道了”而不是“我同意”。

其他需要协商的主要议题还有：发展海外校园的当地运营公司的股份配额问题，以及退出战略的各项条款。由于（出于信托或立法原因）几乎没有大学能够向海外运营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商业合作伙伴最普通的角色在于提供物理基础设施，有时也提供设备。这样一来，争论就集中到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和新大学的品牌上，这些经济价值和品牌问题也常常被用于计算大学的盈余或赤字比例。这类争论渐渐变成了讨价还价，甚至也

发生在世界一流院校中，例如，诺丁汉大学不得不接受其在两所海外分校的运营中只占37.1%和29.1%的股份。在讨论期间，境外教育提供者就已经决定要未雨绸缪，并对退出战略深思熟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在签订《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以防交易无法达成。

管理境外教育活动

一旦境外教育活动投入运行，关键问题在于决策地点选址以及当地董事会/学术合作伙伴的委托职责界定。多数国际分校都归属于一个当地的合资公司，关键决策由公司的董事会做出。不过，大多数跨国教育活动在当地没有法律实体，并且受主校区的学术组织管理。招生标准（和相应的学生数）、当地市场战略以及学费水平都是最重要的决策。这时早期投入建立的良好人际关系就能发挥作用了。商业合作伙伴会受到诱惑而降低招生标准、采用激进的当地市场战略、增加学费，但是大学不可以这样做。

几乎没有什么境外投资者有大量的财政盈余。许多投资者要花5~10年才能看到投资回报。然而，也有获得合理财务收益的例子。研究发现，澳大利亚最成功的一些大学声称自己的平均资金利润率达到8~10%。但一个关键问题是计算出10%利润率的成本依据是什么；因为如果所有的管理和工作时间都要投资者付钱的话，要达到这个利润率是几乎不可能的。样本中的许多大学声称，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创造财务盈余，而是促进他们在该地区的声誉，与合作伙伴一起发展合作研究或者专门在该国发展合作研究，以及帮助主校区发展研究生生源。

尽管该研究强调了摸清市场后再做财务计划这些严密进程的重要性，但是关键结论

是有这些还不够。成功的境外运营要求具备良好的领导力、专业技能和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以上都具备，那么就能克服那些难免会产生的突发状况和剧变。

全球排名对拉美大学不公平吗？

Andrés Bernasconi

智利天主教大学 (the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教育学院高等教育教授

电子邮箱: abernasconi@uc.cl

在201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中,没有一所拉丁美洲的大学进入100强,400强中也只有区区4所。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中拉丁美洲也表现不佳:只有1所大学跻身150强,只有10所跻身500强。

这种状况多少令人困惑,因为巴西和墨西哥已经分别是世界第六大和第14大经济体,本该能在支持高校发展上有所作为,况且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都有三所大学跻身上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100强,荷兰也有2所。

拉丁美洲的大学领导人的确认为排名有问题,他们说,排名对拉丁美洲存有偏见,对拉丁美洲地区不公平,拉丁美洲的大学与排名所反映的大学概念有本质区别。

问题在于排名

2012年5月,一些拉丁美洲的大学领导人齐聚墨西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的支持下探讨排名和应对排名的措施。会议的结论是,排名对大学绩效的评估无效——复合指标无效,每个测量变量也无效。另一个结论是,排名不适合评价拉丁美洲的大学——“排名标准偏好更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大学的责任和功能”。校长们还指出,对盎格鲁撒克逊大学模式的偏好受汤森路透(ISI-Thomson

Reuters)和SCOPUS论文和引用数据库的强化作用,这些数据库主要收集英文撰写的材料并且专注于“健康科学和工程领域”。

当然,拉丁美洲并不是全球唯一对排名偏见提出异议的地区。至少亚洲的大学也如此,甚至比拉丁美洲的大学更有动机来反对排名的不公正:毕竟,亚洲的大学数量更多,也不属于占据支配地位的西方传统大学。然而,多数在排名中进步最大的大学都位于亚洲: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他们并没有抱怨韩文或中文期刊数量不足,相反,亚洲的学者们自学英语并在国际上用英文发论文,就像以色列和荷兰的学者那样。

多元的拉丁美洲大学

现在,拉丁美洲的大学有什么独特的责任和功能会值得被人们与“盎格鲁撒克逊”大学模式区别对待呢?拉丁美洲的大学一般会提到他们的“社会”使命。所谓社会使命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指大学应该做的所有事,但不包括研究、教学、研究成果转化等任何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所具备的功能。独特的社会使命概念主要是为了描绘大学在培养民主、促进社会融合或强化国家身份上应该和正在扮演的角色。拉丁美洲的大学常常在民主规则崩溃后起作用,只有大学和极少的其它机构仍然保有相对自由和政治组织。这当然是有价值的事业,但拉丁美洲地区的大学并不因此而和其它大学不同。此外,随着民主治理和法制在拉丁美洲的巩固和确立,大学的政治辅助角色越来越淡化,需要

作为知识中心重新发挥恰当的大学功能。

排名给拉丁美洲传达的讯息

排名是促进大学改进质量的有效方法，然而这个观点受到很多批判。人们不需要认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在每个方面都比排名第120名的大学来得“更好”，但需要了解研究导向的排名年复一年传达的讯息：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在世界研究舞台上几乎毫无能见度。

是的，正如大学校长们说的那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拉丁美洲高校经费不足导致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也不是主要问题。1990年代以来，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就大大增加了对研究的公共支出。论文也因此增加了，但在全球没有产生什么反响。拉丁美洲的大学主要缺乏两个资源：大量充足的、具有奉献精神的研究人员，以及良好的大学治理。

在大多数拉丁美洲最好的大学里（除了巴西最好的那几所），持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仍然是少数，教师们所用的语言除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之外仍然与世界格格不入（巴西也一样）。此外，该地区许多经过研究训练的学者工资太低，以至于他们需要身兼数职才能满足生计所需。很难期许没有经过研究训练的教师、没有经济保障的研究人员或者只

有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知识基础的学者能做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表现。

第二个主要障碍是大学治理和国家高等教育体制的管理。大学自治反对拉丁美洲的准宗教特征，但几十年来却维护着腐败无能、疯狂而独裁的政权，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悲哀的是，大学的这种自治功能在今天的一些国家中仍然理所当然。不过，受到理性领导的稳定民主制度正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推动并巩固大学的文明对话空间，这对大学特权带来的风险很低，也允许大学领导制定相关高等教育政策，而不是当面关闭自治的大门。这很重要，因为多数拉丁美洲的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没有有效的领导或改革自身的内部政治平台。因此，他们需要与政府合作（在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这样做的大学也越来越多了），以找到改革的新战略和新机制。有几个重要维度强烈需要改革：学术官员必须更换上任，研究经费必须给予那些能做出成果的学者，教授的职业框架和工资待遇必须重新设计。在行政领域，大学需要改革和引入长期的战略决策制定，要抑制行政系统的膨胀，要限制党派政治对大学食物的毒害。这样的改革可能将拉丁美洲的大学带入新纪元，那时他们将会更加适应研究导向的排名。

追求教学卓越和研究卓越的启示

Johannes Wespel、Dominic Orr、Michael Jaeger

Johannes Wespel: 德国高校信息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 (HIS-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研究员

电子邮箱: wespel@his.de

Dominic Orr: 德国高校信息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项目主管

电子邮箱: orr@his.de

Michael Jaeger: 德国高校信息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副主任

电子邮箱: m.jaeger@his.de

最近几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的许多成员国流行创建科学卓越的国家计划, 用于指导和资助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的“卓越计划” (Excellence Initiative)。本文思考了大学教学在现有的各种卓越计划中的地位, 总结出两个观点: (1) 教与学在大学的卓越资助计划中居于次要地位; (2) 相比研究卓越, 教学卓越的定义和相关计划缺乏统一。

卓越行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个工作小组对以科研卓越为目的的国家资助项目进行了正式分析, 各国专家在该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上对其结果展开了讨论。数据材料涉及四个大洲、16个国家的24个相关计划。分析表明, 各国不同的卓越行动计划具有一个典型模式。通过一个竞争性的多级程序遴选出有限的几个拥有高层次科学家的研究中心, 此过程中会引入国际同行专家审议, 有时还组织现场访问。这些遴选出的研究中心会得到慷慨的政府资助, 开展研究项目, 不过这有赖

于其在绩效评估中的表现。这些中心获得资助的时间要比一般研究项目获得资助的时间更长。样本显示, 这些中心受到资助的平均年限超过六年, 推进研究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也是资助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至今, 多数计划已经实施了好几轮。卓越计划的政治目的相当普遍, 常常不与特定的科研领域相关联。提高国家科研系统的竞争力、通过校际合作和/或跨领域合作促进新的协同效应都是重要性很高的目标。许多卓越计划都起源于国家创新战略; 在这些战略中, 公共研究部门可能是重要的基础要素。

教学的地位

大学是这些卓越计划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大学通过教与学服务于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因此, 我们需要观察公共资金如何平衡支持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 本研究就样本卓越计划, 分析了计划描述中教学是否与研究计划评估标准相整合以及整合方式。研究发现, 大量的行动计划专注于与研究相关的因素, 例如过往的研究成绩、研究项目的创新性和弹性以及研究成果的实

用性。多数行动计划的评估标准并不涉及教学。只有少数计划会专门考虑教学方面的因素，如西班牙的“国际卓越校园计划”（International Campus of Excellence Initiative，同时强调研究和教学卓越），爱尔兰的“高校研究计划”（Program for Research in Third-Level Institutions，教学影响力是四大评估标准之一），和德国的“卓越计划”（“研究对教学的影响”是15个不同的标准之一）。

研究显示，“卓越”一词在国家资助项目中的意思明显偏向研究绩效。批评人士担心，官方给予的“卓越”地位为学校带来了独特声誉以及大量的研究经费，这样可能会促使大学的科学家专注于研究而轻视教学。在这样的争议背景下，一些国家已经启动了独立的行动计划以培养新的卓越教学观念。这些教学卓越计划在内容和遴选程序上明显受到以研究为中心的卓越计划的影响：国际同行专家对大量竞争性计划进行质量评估，最后只对有限的几个非常杰出的申请者进行资助。此类教学卓越计划的代表有：芬兰的“大学教育卓越中心”计划（Centers of Excellence in University Education），该计划资助的单位需要在长期改进大学教育质量和关联上发挥重要作用；英国的“教学卓越中心”计划（Centers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gram），该计划在2005~2010年间非常活跃，资助了英国大学74个教学发展中心；法国2012年启动的“创新教学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s in Innovative Teaching），该计划旨在为其它高校建立创新教学的范本；以及德国的“卓越教学”计划（Exzellente Lehre），该计划为10所高校实施创新教学观念提供资助。

卓越和多样性

我们在仔细分析了专门针对教学卓越项目的描述后发现，受资助的单位以及为了追求和维护卓越而采用的衡量标准也各有不同，即使是在单个项目中也是如此。符合条件的受资助单位包括院系、大学、有固定期限的项目和跨机构的网络等。它们可以是独立的研究中心，附属于现有的教育单位或者自身独立存在。所采用的具体衡量标准包括师资资格、课程改革、学生能力发展、网络学习或加强学生在大学治理中的影响力等。这和研究卓越行动不同：在各国的行动计划中，后者对卓越的定义、取得卓越的方式的理解都更加统一。另一个发现是：教学卓越计划为项目所提出的观念树立了模仿作用，比如，除了强调观念创新以外，计划的主要评估标准可以用于衡量其他院校，具有可转移性。而在研究卓越计划中，可比的指标并不多。因此，教学卓越计划似乎和研究卓越计划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研究卓越计划被视为运用已通过试验的运作模式来搞清楚科学价值创造的一种方式；教学卓越计划的特征更加偏试验性，其首要的预期目标是帮助搞清楚卓越教学是怎么回事。

人们仍然较为犹豫，是否应该将教学加入国家主要卓越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教学卓越的程序、标准和措施缺乏共识。教学卓越是否能及时取得统一认识、路径的多样性是否能保持，这些都还有待观望——答案可能取决于教学活动的背景和方式。如果无法建立教学卓越，研究很可能将继续主导高等教育卓越的定义。但是，对研究的聚焦，会模糊人们对高等教育满足大众化需求所面临挑战的认识。

印度：高等教育物有所值吗？

Philip G. Altbach、Pawan Agarwal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Pawan Agarwal: 印度政府规划委员会高等教育顾问

电子邮箱: apawan08@gmail.com

尽管印度的高等教育功能失调，但是和一些国家相比其高等教育体制的确是优越的——堪称“矮子里面的将军”。以下是一些可证明该说法的例子：

- 印度的高等教育公共和私人支出占 GDP 的比例位于全球前列。印度在高等教育方面支出了很大比例的国家财富，占 GDP 的比例达到 3%（1.2% 来自公共支出，1.8% 来自私人支出），比美国（1.0% 公共，1.6% 私人）和韩国（0.7% 公共，1.9% 私人）的高等教育支出还要高。这表明，未来的增长空间有限，尽管未来要投入更多，因为高等教育支出的绝对数字仍然不能和国际相比。此外，经费亟需有效利用，如此才能促进平等、追求卓越。
- 印度的毛入学率为 18%，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与印度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中是非常高的。在印度国家大、国情复杂的背景下，这一成就非同小可。最近通过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12th Five-Year Plan）预计 2017 年毛入学率提高到 25%，这个目标既能满足需要，也是可以达到的。
- 最后，学者的工资经过购买力平价后，和其他国家相比也非常可观。最近对 28 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印度学者的起始工资排名第四，是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

国）中最高的，而中国的平均工资则垫底。印度的这一结果源于 2006 年实施的增加收入措施。

物有所值？

印度的高等教育投资有价值回报吗？与此同时，面对挑战，增加支出能解决问题吗？多数观察人士认为，印度院校一般都不能帮助学生获得体面的工作，绝对不是“世界一流”。本文提及的积极趋势受到大量因素的影响。尽管印度在高等教育上进行了大量投入，经费不断从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流入高等教育，但这些钱并未发挥应有的效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几乎没有协作。

印度有 34 000 所本科院校，其中很多院校都规模太小、难以为继。大多数的学校都人员不足、设施匮乏；三分之二甚至都不能达到政府规定的最少招生人数；由于严格的官僚管理制度也阻碍了学校的创新。所有这些原因造成印度高等教育体制高度脆弱、分散和难以管理。巩固和合并小院校的呼声很大。但是，体制问题多且根深蒂固，要彻底消解它们既不可行，也不适当。然而，部分课程的分散化似乎更为合理。随着学术自治的增强，大学可以保留核心课程，不过其余课程责任可以被转让给其他院校。这可能会

在院校内部形成所需的创新文化。集群和合并小院校也可能被列入改革计划。此外，拥有大量附属院校的大学可能需要被重组成两所大学或者更多大学，从而使附属院校的数量减少、改进大学整体的学术效率。

尽管印度的毛入学率在相关的国际标准下并不低，但是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足有40年之久。美国1940年代的入学率就达到15%，多数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后也达到了这个数字。1975年，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的入学率分别是18%、23%、24%和25%；韩国1975年只有8%，1980年上升到13%，1985年快速上升到34%。所有这些国家的体制都发展到接近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程度；但是，必须意识到，入学率的上升不是被单方面因素推高的，其基础是对合格劳动力的需求，其中农业对劳动力的贡献需小于5%。考虑到一半以上的印度人民仍然在务农，对高素质人口的需求有限，目前印度的入学率水平似乎已经足够了。更大的挑战在于，学生没有选择最能对经济发展做贡献的领域，或者是对他们的就业期望有帮助的领域。同时，雇主们频繁抱怨毕业生不能达到工作要求。

尽管相比国际同行，印度学者们的确收入丰厚，但并不有效。学者们，特别是高校教师，受制于严格的官僚管理制度。此外，

他们的工作没有得到仔细评估——工资增长和晋升更依赖于资历。不幸的是，自从2006年工资增加之后，教师职业和评估要求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相应的改革。教授、讲师任命和晋升的“学术表现指标系统”有待深化。印度学者们似乎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多数人都兢兢业业——但结构性问题和僵化的文化是拦路虎。

我们的总体印象是，尽管印度在某几个领域与全球相比表现不错，但是体制和文化深处的问题限制了学术体系的运行效率。

结语

印度的高等教育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如何利用这些计划并对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这是印度面临的挑战。对印度而言，财政开支并不意味着效用。因此，印度高等教育可以类比美国的医疗保障系统。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最高，但支出并没有带来效果。奥巴马的改革就像印度的第12个“五年计划”一样，可能最终能够改进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特殊利益和矛盾控制已久的僵化体制。改革旨在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投资结合起来——将新效益和需求结合起来。改革也试图通过深化竞争性拨款和创造相关制度措施，以期打造绩效文化。然而，要取得成功需要有效的措施。

印度的教育国际化战略

P. J. Lavakare

印度拉贾斯坦邦莫迪理工学院 (Mod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理事会成员

电子邮箱: lavakare@vsnl.com

高等教育在全球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化已经为人才招聘打开了全球市场, 学生们都渴望抓住工作机会。所有教育提供者都注意到学生们想成为“世界公民”的需求。在一些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被视为一项营利性活动: 建立海外分校, 拓展新的经济领域。对一些国家而言, 招收国际学生是一项收入渠道, 能平衡院校的预算衰减。学生正在成为国际教育的驱动力。然而, 在印度, 教育国际化却并不起眼。印度内部仍然对怎样应对国际化进程存在争议。在最新的国家发展“五年计划”中, 一个新计划正在形成。

扩张——国际伙伴关系的角色

印度的国际化战略受到国内关注点的制约。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增加, 而毛入学率却只有约 19%, 因此国家关心的是增加高校数量。需要的资源超出可获得的预算。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和国际高等教育提供者, 印度愈发具有吸引力, 这些都能加强印度高等教育的实力。国外高校进入印度市场的大门并没有完全打开。在这些限制之下, 发展政府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能更具可行性。当前, 我们可能需要分析印度过去是怎样受益于国际伙伴关系的, 也要分析其中一些模式是否仍然适用。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 人们喜欢在一些教育领域, 如农业和科技方面, 将印度的经验和美国联系在一起。在农业部门, 印度于 50

年代引入“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 这可以追溯到印美两国在农业科学上的合作。该合作帮助维护了农业研究和教育。印度的农业教育非常受益于政府层面的院校教育合作。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一些美国大学联合起来促进了一些印度教育机构的建立, 例如位于坎普尔的印度理工学院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位于新德里的国家教育、研究和培训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 Training)。它们都是在两国政府荫庇下的学术伙伴关系中建立起来的。现在, 这两所学校的教师 and 治理都归印度。我们能用这种模式, 推动印度政府增加学校数量吗? 两国政府可以合作建立一些新的教育机构吗? 如果这种模式被证明是有效的, 那么政府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显然要比全面放手给私立院校扩张更加有效。通过双方协定, 印度和美国的大学也可以合作, 共同在印度建立教育机构。新的高等教育“五年计划”已经暗示了需要针对国际化的政策。新政策可以为这种政府层面的计划开辟渠道吗?

根据印度大学协会的报告, 2010 年有 630 所外国高校在印度招生。几乎所有院校都未经批准, 授予学位的权利没有得到印度政府认可。从这些院校获得学位的学生不能应聘公共部门的工作, 也不能申请印度的研究生专业。未来, 国家法律一定要让这些院

校能够在印度政府注册。这些院校的命运在未来数年都不确定。这样的外国教育提供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玷污了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形象。

教师间合作

印度高校整体上缺乏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政府已经介入，正在考虑新的“五年计划”中的国际化道路问题。政府已经公开了计划，正在实施与发达国家合作的相关措施，将印度教师送往具有国际水准的国家和学校接受教学和科研培训。尽管措施很奏效，但仍然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使是印度理工学院这样的高质量院校，也无法招到大量合格教师。政府一般不允许印度大学聘任外国教师。此外，院校可以支付的工资对教师而言没有吸引力。由于无法在国内外招到教师，因此仅仅通过“教师海外培训”并不能有效推进教育体制的国际化。

通过合作提供联合学位项目

政府正在试图实施一个教育国际化战略，以鼓励印度的院校与外国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印度学生提供联合学位项目的学习机会。外国大学并不需要在印度开办分校，但是他们的教师可以在印度教授被批准的课程。学生也可以在四年本科学习中花一些时间在印度，其余的时间在外国。这是国际化的一项有吸引力的措施，可以为印度学生提供了“融入全球”的机会，学生可以用较低的花费获得国外的学位。学术质量、财政措施、联合学位的认证和管理都要在合作院校之间达成协议。然而，在院校能够探索机会之前，政府已经警告印度私立院校要谨慎选择可以合作的院校。政府坚持认为，印度院校只能选择一个国外“伙伴”院校，且

这些院校必须位于国际排名前500名。那么，排名靠前的国外院校愿意屈身与“榜上无名”的印度院校合作吗？这对建立伙伴关系没有吸引力。不幸的是，这一国际化措施似乎也不可行。

缺乏对国际学生的关注

最后一个国际化战略的领域是将印度学生送往国外，并将国外的学生吸引来印度。政府已经允许印度学生自由赴海外求学。政府没有计划（不像巴西已经指定了计划）为赴海外（如美国）求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印度也不打算通过支持印度学生去中国或巴西求学来促进与其他国家的文化理解。奥巴马总统的“十万教育交流”计划（100 000 Strong Educational Exchange Initiatives）要支持美国学生赴中国求学。印度在吸引外国学生上也缺乏大计划。好的住宿、教师、充分的学生咨询服务等基础设施都是支持国际学生前来学习的必需品，但印度高校大多都不具备这些。此前的国际学生多数来自非洲。最近几年国际学生数量降低了，印度也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把他们吸引回来的意图。印度的国际化战略中缺乏对学生的关注。

结语

印度敷衍着国际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学生、教师、教育机构），在行政管理和法律法规框架方面毫无作为。2004年，政府的确在其国家管理机构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下面建立了几个学术委员会，旨在促进印度高等教育走向国外；2009年也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制定了行动计划。但不幸的是，这些委员会推荐的政策都没能在印度的国际化战略中反映出来。新的计划提出建立一个专业的国家机构，

即印度国际教育中心 (the Indi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re), 以实施国际化活动。人们希望该机构能支持一些院校建立专门的国际

化单位。但愿这个新机构不会在印度高等教育官僚主义的迷宫中走失。

英格兰的教育处于困境中？

Heather Eggins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访问教授

电子邮箱: heggins@btinternet.com

英格兰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欲将国民能力最大化，从而运用人民的智慧让国家致富。因此，在过去的10年中，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已经成为英国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但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英格兰教育面临很多问题。工党执政时，政府在提高弱势群体入学率上取得了一些成功，2004年弱势群体入学率为18%，现在已经有所改进。政府也引入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包括暑期学校、学生辅导、访问当地的大学、经过特殊设计的“入学机会”课程。但是，随着弱势群体入学率上升到30%，大学却在混乱、矛盾的政策中困住了，这些政策可能会威胁扩大入学机会计划的成功实施，并且会动摇整个体制。

当前的政府措施

目前执政的是保守自由民主党，他们于2010年上台，执政期间恰逢国际金融危机，英国需要引入强硬的财政措施，将学费上升到每年9000英镑，学生因此拥有了相当大的“购买力”。现在，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奖/助学金机会，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能够在高中联考中获得“两A一B”的成绩，那么就可以就读心仪的大学和课程。那些获得最高分的学生可以去他们选择的任何学校，这个事实意味着大学预算无法精确计划。一定程度的不可控风险随之而来，这为大学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大量院校处于赤字中。

公平入学

“扩大入学机会”的概念意味着吸引更多学生，扩张整个体制。“公平入学”的概念让所有来自弱势背景的、达到入学要求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大学。最近的一份政府报告建议制定一项新的国家入学机会战略。由当地协调员组建网络，瞄准小学，通过中学和预科学校 (sixth-form studies) 帮助学生。组建此类网络的目的在于从小学年龄段就开始支持聪明的孩子，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帮助他们进入大学，保证他们有完成学业的能力。

公平入学办公室 (the Office for Fair Access) 是一个政府机构，其作用是批准并帮助那些年学费超过6000英镑的高校实施入学机会的相关政策。人们希望相关大学入学机会的政策可以包括一系列助学金计划，以及其他促进入学机会的措施。最精英的大学一直以来都有更高比例的学生来自私立学校，他们正面临接收更多来自弱势背景学生的压力。

然而，在目前的入学计划政策背景下，财务危机仍然存在。在英格兰，本科学习的学费最高达到9000英镑。学费负担已经从直接的政府对高校拨款变成政府为经济能力不足的学生发放贷款。这让非全日制学生和私立院校的学生也可以获得资助。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还可以获得针对其生活费的试验

性拨款。

配额问题

英国体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控制数量的方式。每一所大学都有配额，由拨款委员会（the Funding Council）分配。在制定降低配额、惩罚超标的政策以前，基本上已经很难不达到目标或者越过这个目标。这个系统虽然很难管理，却运行得很好；然而，为了学生开放更多选择机会，该体制的运行也开始趋于不稳定状态。

问题与挑战

两个行动计划引发了现今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行动计划与大学的收费范围有关。为了保证高校为学生提供不同的价格选择，2012年政府在大学中提供了2 000个收费在7 500英镑及以下的入学机会。这是为了刺激大学把学费调整到7 500英镑及以下，让本科学院提供学位水平的课程，从而才能从政府获取更多的钱。然而，这一刺激措施并没有奏效。在分配给大学的9 600个入学机会中，有4 200个机会空闲；在10 400个继续教育机会中，有2800个空缺机会——即超过三分之一的入学机会没有被利用。

第二个行动计划则导致了更为严峻的后果、制造了不确定性，为大学带来了很高的风险。2012年，政府允许英格兰的大学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招收了许多额外数量的获得“两A一B”成绩（最高成绩）的学生。这似乎对那些最精挑细选的大学（如罗素集团[the Russell Group]）有利。然而，2012/13学年，18岁的适龄申请人数降低了5%，19岁及以上的申请人数降低了15~20%。获得两A一B成绩的申请者数量减少，这让

一些大学不能招到足够的、符合他们期望的学生。虽然布里斯托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的招生人数增长了28%，利物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和南安普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都没能招到足额学生。在罗素集团之外，其它学费低于9000英镑的大学存在很大的多样性，斯塔福德大学（Staffordshire University）招生数降低了3%，利兹都市大学（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则降低了23%

2013/14 学年的情况

2013/14学年的政策安排为英国体制引入了更大的流动性：这次，具有一A两B成绩的学生（比“两A一B”的学生多很多）可以进入任何一所大学。增加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的规则也随之被改变：只有5000个入学机会，但其中的许多入学机会位于学费范围在7500英镑到8250英镑之间的院校。

同时，每一所大学继续会被分配到一个固定的招生配额。11所高校在2012年超出了限额；他们收到了罚款。也就是说，招收过多的学生，学校就会被罚款；而招收过少的学生，未来可能会被削减配额。几乎没有院校愿意违背政府的限制。2013/14学年，英格兰大学的申请人数比上一学年小幅上扬（2.8%），但比2011/12学年还差很多。下一学年的波动性可能会更大。突然的政策调整、学费剧增，这都让英格兰的高等教育体制变得不稳定：越来越多的英国大学将面临财政赤字。2013/14学年的招生结果可能进一步恶化金融风暴带来的后果，招致难以接受的金融风暴。正如高等教育部部长所言，“学生”现在正“把握着控制权”；院校则在退缩。

展望 2025 年英国高等教育

Jeroen Huisman、Harry de Boer、Paulo Charles Pimentel Bótas

Jeroen Huisman: 英国巴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ath) 教授

电子邮箱: j.huisman@bath.ac.uk

Harry de Boer: 荷兰特温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wente) 高级助理研究员

电子邮箱: h.f.deboer@utwente.nl

Paulo Charles Pimentel Bótas: 英国巴斯大学研究主管

电子邮箱: paulobotas@gmail.com

2009年,工党政府试图寻求对英国高等教育经费未来方向的独立观点。2010年,布朗(Gordon Browne)委员会发表了报告《确保英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未来》(*Secur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Higher Education*)。由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新政府采纳了布朗委员会的诸多建议,并将其融入2011年的白皮书《以学生为核心》(*Students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中。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些政策会动摇高等教育体制。例如,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对学生和高校造成深刻影响的措施。白皮书的关键内容是,高校可以将学费定在6000英镑到最高9000英镑之间,以前大学学费则一直保持在3290英镑。基于学生数量和学生就读专业而分配给高校的教学拨款可能遭到终止,这使得高校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学费收入。尽管招生数量或多或少都是固定的(高校每个专业招收的国内学生数量有限),政府提出让四分之一左右的招生比例根据高校的竞争力进行分配,允许院校竞争招生名额。

影响

观察人士担心更高的学费水平可能会阻

碍学生的高等教育求学之路,尤其会影响来自社会经济底层的学生;因此,最终会威胁高等教育的入学公平问题。同时,一些高校可能会在竞争体制中失利;最大的交易联盟预测,大约四分之一的高校可能会受到生存威胁。人们还争论,政策可能打造出一个新的二元体制,因为政策可能在研究型大学中运行得很好,而对教学型大学的繁荣发展可能会造成不利。

尽管人们充分论证了预期影响,并用实证证据支持论证,但很明显,完全预测政策改革的结果是不可能的。联想到一个关于政策变革研讨会的主题“大期待和混合表现”(Great Expectations and Mixed Performance),也就是说一项政策的实际实施可能与政策初衷不同。同时,未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将从政策改革开始,继续对体制施加独立的影响,并可能潜在干扰政策的初衷。

德尔菲研究

因此,如果要对英国高等教育体制未来的形态和规模进行辩论,并对结果的可能性和有利性进行反思,就要讨论潜在的发展。因此,我们启动了一个德尔菲研究(Delphi

study, 研究受到高等教育领导力基金会[the Leadership Found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的资助)。在这个德尔菲研究中, 高等教育专家被要求对 2025 年潜在的发展和环境的相关论述进行反思(例如, “2025 年, 英国高等教育中私立院校招收的学生比例为 15%”)。在我们的研究中, 44 位专家各自对 2025 年一些发展的可能性和有利性进行了评论(研究提供了 21 项陈述)。在第二轮研究中, 70% 的专家对第一轮的观点和假设进行了反思。几轮反思都可以被用于德尔菲研究(例如为了达成共识)。我们认为, 两轮研究的数据已经很丰富, 我们利用整个数据库中的观点搭建了两个英国高等教育的图景。

图景 1: 2025 年二元分化的回归

第一个图景起源于一个假设: 过去二十年引入的市场机制将继续协调体制。这暗示着 2025 年会存在一个更小的体制, 院校会在经济危机中合并或者消亡。传统的大学和曾经的技术型大学之间的区别会拉大, 形成一个新的二元体制。2025 年的体制可能会有约 25 所研究型大学和 70 所其他类型的高校。研究型院校更加趋同; 只要国际竞争者也同样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英国院校在全球排名中仍然保持前列。非研究型院校会更加分化, 但共同之处在于对本科项目的聚焦, 尽管研究卓越仍然相当重要。私立(营利性)院校已经能够进入市场, 2025 年会存在大量更小规模或中等规模的私立院校。

图景 2: “看得见的手” 回归

这一图景提出, 对市场机制失败日益增加的批评导致政府为了不负承诺而被迫直接介入。更多的投资与强势的政府监管联合在一起, 导致 2025 年出现一个三层体制: 6 所研究型大学(这六所超级大学能够追究卓越战略, 是少数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员) 学费相对较高; 约 40 所具有多个使命的综合型大学(重点大学); 5 所私立大学(当学生决定去公立大学就读时, 它们的发展会遇到挑战)。由于强制执行综合型大学之间的地区合并, 体制会比现在小得多。这些院校很繁荣, 部分源于它们之间建立的良好网络和合作, 它们还具有很强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

结语

两个图景都指出, 英国高等教育体制将开展相当剧烈的变革, 这一变革可以媲美 1992 年二元体制的废除: 院校的数量会改变, 它们的形象也会改变(研究型或教学型, 非营利性或私立院校)。入学机会、经费和质量保障会有重要改变。两个图景包括教学和学生群体等更多的细节。当然, 到 2025 年, 我们的预测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那不是重点。我们希望, 未来数年两个图景能够引发针对未来世界的辩论, 打造一个学者、高校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学生都愿意看到的未来。

注: 该文全文刊登于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66 (4), 341-62。

维持学生贷款体制的挑战：哥伦比亚和智利的发展

Jamil Salmi

高等教育顾问，世界银行前高等教育主管

电子邮箱：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由于学生抗议，智利政府去年差点在学生贷款体制上跌倒。智利学生贷款危机导致哥伦比亚也要求人人享受免费高等教育，这样一来，所有学生贷款种类都会失效。拉丁美洲终结学生贷款就在眼前吗？相比之下，美国也对学生贷款日益关注，1万亿的学生贷款债务数字也预示着学生贷款政策和措施的失败。最近《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专栏文章中，Charles Blow将美国的债务水平描述为“步履蹒跚”，“对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会产生长期影响，因为一旦年轻人成家或买房，债务影响就会开始显现”（2013年3月8日）。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以及美国学生贷款的启示下，本文旨在与读者分享智利和哥伦比亚的发展教训。

智利的情况

一开始是中學生要求将他们的免费公交卡从10个月延长到整年。讽刺的是，政府拒绝了这项最初的要求，理由是预算成本高，但后来又同意了一篮子改革计划，成本是原来的20倍。这变成了一股对抗力量，反对中學生和大学生组织以及整个政府。大学学生的主要领导派别最后要求修宪保障各阶层的所有学生都能接受免费的、高质量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

公平地说，学生有合法宣泄怨气的权利。几十年中，智利曾经隔离了高等教育体制，

两种不同的大学为学生提供不同的利益。一种是16所公立和9所私立大学，它们受政府补贴，其学生有资格获得慷慨的奖学金，可以申请获得高补贴的、按照收入还款的贷款。另一种是36所私立大学，他们不能获得政府拨款，但接收了全国53%的大学生。这些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机会有限，但有资格申请商业银行于2005年开办、政府监管的贷款。新计划在引领风向上非常成功，有一个好的目标体制。到2011年，两类大学中共75%的学生申请了贷款。但是当第一个还款期到达的时候，计划的运行开始遇到严重问题，因为一些毕业生发现他们有很高的负债水平，但还款能力有限，因为计划不是与收入挂钩的。根据月还款超出月收入来计算，智利平均的债务率达到18%，澳大利亚是4%，新西兰是6.4%，英国是2.9%，荷兰是2.6%。结果，债务拖欠率很快上升到36%，这对一个年轻的学生贷款项目来说非常高。不出所料，抗议学生的主要要求就是废除学生贷款项目。

几个月前，政府宣布，意图将两个已有的学生贷款计划合并，将第一个学生贷款条款和条件推广到整个学生贷款系统。这意味着，除了其他方面，还款将与收入挂钩，允许学生选择最心仪的职业、用未来收入的固定比例偿还学位教育的贷款，因此让债务负担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按月还款的额度是月收入的5~15%不等，依赖于毕业生的收

入水平。还款将通过税收体制进行，尽管财政部长很不情愿卷入到学生贷款还款的管理中去。

哥伦比亚的情况

世界上几乎没人知道，第一个学生贷款机构于1951年建立于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学生贷款机构“哥伦比亚教育信贷机构”（Instituto Colombiano de Credito Educativo）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哥伦比亚年轻人 Gabriel Bettencourt 的梦想。他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受益于一项贷款，是他说服共和国的总统建立一个机构向所有有需要的哥伦比亚人提供类似的服务。

几十年的不均衡发展过去了，哥伦比亚教育信贷机构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有力、最成功的抵押型学生贷款机构。在有远见的总统的领导下，并在世界银行2000年后建立的两个贷款项目的相继支持下，哥伦比亚教育信贷机构的服务推广到19%的学生，聚焦于那些来自社会经济底层的学生。至今为止，这是拉美最高的学生贷款覆盖率。哥伦比亚教育信贷机构还改进了收款记录：将逾期贷款从2007年的22%减少到现在的13%；将管理实践现代化，运营成本从2002年的12%减少到现在的3%。哥伦比亚教育信贷机构还与参与的大学合作，不仅为贷款人提供财务支持，还提供学术和心理支持，这大大减少了贷款人相对于其他学生的辍学率。

然而，这种贷款方式近年来面临两类问题。首先，在经济危机中，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发现自己很难履行还款义务。没能还款的毕业生比例已经达到17%。第二，智利危机也影响了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公立和私立大

学的学生也要求全面废除费用，增加公立高等教育的经费，将学生贷款变成拨款。几个月前的一天下午，他们到哥伦比亚教育信贷机构门前抗议，最后砸碎了建筑物的窗子才结束。通过基本趋于平和的师生示威，来自街头游行的巨大压力迫使政府从国会撤销了《高等教育改革法》（*Higher Education Reform Law*）的草案。

总结教训

许多年以前，笔者的学生贷款督导 Bruce Chapman 教授自信的和我分享了成功运行学生贷款计划的三个秘密。一是收款，二是收款，三还是收款。无论哪个国家运行哪种学生贷款都注定都要失败，除非你有一个恰当的收款机制。

传统的抵押型学生贷款计划在设计上有缺陷，就像智利和哥伦比亚所展示的那样。随着失业率上升、收入停滞增长，没有与收入挂钩的贷款在经济危机的时代一定会造成问题。

显然，与收入挂钩的贷款体制更可能成功。但是拥有一个简单、安全的收款制度的必要性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挑战。笔者认为，智利将收入和税务管理结合起来进行学生贷款收款的办法很有效，比哥伦比亚要好。这是最近危机的积极结果之一，强迫智利人想出一个更理性的、有效的学生贷款发放和回收的办法。我希望哥伦比亚不要经过一场严重的危机才发现，其运行机制应该过渡到收入挂钩的学生贷款模式，这个模式能使哥伦比亚教育信贷机构进一步巩固它已取得的进步。事实上，哥伦比亚教育信贷机构已经为毕业生打开了收入挂钩还款的可能

性,且 2012 年已有 200 位毕业生受益于这项新选项。如果这个办法被证明能成功让学生还款更轻松,哥伦比亚教育信贷机构有希望将其推广到所有贷款人之中。

美国工程博士招生

Richard A. Skinner

哈理斯协会 (Harris Search Associates) 高级顾问

电子邮箱: rick@harrisandassociates.com

美国工程博士专业依赖于外国学生, 特别是那些来自印度的学生, 这是一个明证。美国的移民政策在 1965 年进行了改革, 允许亚洲学生到美国大学求学, 且数量每年都有稳定的增长——其中工学是第二大专业。此外, 外国博士学生数量已经大幅上升。到 2006 年, 办理临时签证的外国学生有 64% 获得了工程学位, 许多人仍然待在美国, 一般寻求学术职位。这些学科的教师使得工程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招生数在 2010 年达到 20 年的顶峰。这种稳定增长的趋势能否继续, 仍是一个问题。

需要更大的承载力

近年来, 美国的顶尖工程专业增加了本科生数量, 硕士项目一般也成功地增加了学生数量。但是, 博士专业很少达到最大负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 需要更多的教师教更多的工程学生, 因此要增加博士学生的数量。

博士生的短缺意味着工程毕业生将很难增加, 因此, 国内会有更少的工程毕业生去攻读博士学位。外国学生来到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数比本科学位的人数多。2007 年, 24% 的科学和工程硕士学位、33% 的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和仅仅 4% 的本科学位由外国人取得。但是, 2010/11 学年, 外国学生总数只占美国入学学生总数的 3.5%。

此外, 来自印度的移民是工程博士学生

的一个主要来源, 移民人数很可能继续增加, 因为两国的个人收入存在固定差距, 并且可能加速扩大, 未来印度 16~34 岁年龄段的学生会大量增加。

不断增加的工程专业招生数

在短期内, 美国工学院博士专业的招生和毕业应该继续依赖于国际学生。很多迹象显示, 这种依赖性是一个合理的战略, 但只能是短期性质的。印度的人口趋势预示, 来自印度并且能够在美国获得博士入学资格的学生数量会增加。此外, 印度的研究型大学没有中国的兄弟院校进步那么快; 因此, 美国的院校将继续对想取得博士学位的印度学生保持吸引力, 尤其是因为印度也使用英语。

此外, 2000 年以后, 美国移民政策也对家庭团聚青睐有加, 美国移民中 40% 是印度人。大量印度移民继续进入各种专业领域, 包括工程博士学习。2010 年, 超过 60% 的印度科学和工程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表示自己短期停留结束后仍计划留在美国的意愿。但是, 一些数据显示, 对国际学生的依赖将来可能不是可靠之举。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报告称,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 想留在美国的亚洲学生比例变少了。同样, 当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 特别是印度的经济, 从近几年的全球衰退中恢复过来, 国内机会增加, 那么外国学生数量可能会减少。

对工程专业博士招生数量增加的中期预计，取决于是否能说服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以及是否有对博士生的经济资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生。不一定总能成功说服学生，因此美国的博士专业可能需要招收国际学生。而这本身也势必会影响美国的移民政策。这为“新美国经济伙伴关系”（the Partnership for a New American Economy）提供了一股用户力量，该伙伴关系是由市长，来自微软、波音等公司的头目和纽约市市长彭博联合倡议。

作为“新美国经济伙伴关系”关键原则之一，该组织已经增加了“让移民和那些留在美国工作的外国学生成为美国人力资本的机会，这样一来，我们能够吸引和保留最好的、最聪明的和最努力工作的人才，他们将巩固我们的经济”。联邦的移民法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吸引那些对有兴趣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以及在工程相关领域创业人士前来定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偏好家庭团聚。

长期前景

长期来看，由于美国和外国的职业收入差距减少并弱化了移民的经济刺激，因此外国学生来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很可能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改善及其对教师的需求，都可能使学生留在祖国求学或人才回流祖国。到2020年，单单印度就会要求新增100万教授。

美国的工程博士专业依赖于国际学生，特别是印度学生，这反映了长期的单方面人才流入是如何发生的。如果20世纪60年代中期外国学生没有大量移民到美国追求工程博士学位并留在美国工作，很难想象该领域今天会发展得如何，能对美国空间计划、计算机发展和节能做出什么贡献。

至少在过去，美国工程专业能够保证充足的、高素质的国内外学生，那么类似的事业是否可能在未来取得一样的发展？能否招收到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仍存疑问。

新书快递

Balán, Jorge, ed. *Latin America's New Knowledge Economy: Higher Education,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3. 154 pp. ISBN 978-0-87206-358-7. Web site: www.iie.org.

该书思考了让拉丁美洲在知识经济中增加参与度的关键因素，聚焦于国际交换问题。作者谈及的话题包括公立大学的治理、劳动力培训和高等教育、出国留学奖学金、巴西的研究型大学以及西半球学术交换项目。

Farrugia, Christine, Rajika Bhandari, and Patricia Chow.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2. 112 pp. ISBN 978-0-87206-353-2. Web site: www.iie.org.

国际教育协会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年度出版物论述了学生流向美国和流出美国的趋势。该书包含关键趋势的统计数据：来到美国学习的学生的数量和来源国、美国出国留学生的趋势。该书包括学生数量的细节，例如哪些大学、专业等。

Goodman, Roger, Takehiko Kariya, and John Taylor, ed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Changing Relationship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Oxford, UK: Symposium Books, 2013. 270 pp. ISBN 978-1-873927-76-2. Web site: www.symposium-books.co.uk.

大众化时代，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一直在变化，因为在许多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在缩小，私人部门在扩张。本书聚焦于东亚和欧洲政府不断变化的角色。高等教育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在书中进行了讨论，涉及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和韩国。有若干章节运用了比较视角。

Johnston, Lucas F. *Higher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Cas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rom Across the Curriculum*. London: Routledge, 2013. 262 pp. ISBN 978-0-415-51936-6.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检视了引入可持续和环境保护理念的课程，提供了主要来自美国的一系列案例研究，也有一些案例来自欧洲和加拿大。主题包括旅游和酒店课程中的可持续理念、可持续理念相关课程中跨学科的角色等。

Kwiek, Marek, and Andrzej Kurkiewicz, eds. *The Modernization of European Universities: Cross-National Academic Perspectives*.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Peter Lang, 2012. 360 pp. ISBN 978-3-631-63796-8. Web site: www.peterlang.de.

欧洲的现代化包含一堆复杂的问题，包括博洛尼亚进程、分化体制的发展、治理的变革等等。本书收入了有关高等教育新资助模式、学生财务问题以及对欧洲广袤背景下现代化模式进行分析的文章。

Manning, Kathleen. *Organizational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19 pp. ISBN 978-0-415-87467-0.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旨在成为对美国大学的学术组织进行论述的教科书。该书聚焦于各种组织理论运用于高等教育的诠释。对于每个理论观点也提供了案例研究。在讨论的组织观念中包括“组织混乱”、政治、官僚主义、文化等。

Maximova-Mentzoni, Tatiana. *The Changing Russian University: From State to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2013. 194 pp. ISBN 978-0-415-54018-6.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伴随苏联的解体，大学急需经费，并且大学发现自己很难调整过渡到俄罗斯的新环境中。本书聚焦于俄罗斯高等教育在1990年代的转型变革，以及高等教育的现行措施。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发展。大量分析都基于单个学校的案例研究。

McCabe, Donald L., Kenneth Butterfield, and Linda K. Treviño. *Cheating in College: Why Students do It and What Educators Can Do About I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224 pp. ISBN: 971-1-421407166.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在对31所不同美国大学中学术作弊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发现，三分之二的本科生都曾有作弊行为，研究生和专业学位学生中也广泛存在作弊现象。该书研究了大量与作弊有关的变量，并对减少作弊提出了建议。

Olivas, Michael. *Suing Alma Mater: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ur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232 pp. ISBN 978-1-4214-0923-8.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是对美国法律和高等教育之间高度复杂且有争议的关系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源，该书有一部分是对重要诉讼案件的分析，说明了诉讼如何与学术问题相关联。其余章节关注美国高等教育法的广泛问题以及与最高法院诉讼政治相关的新趋势。

Rolfe, Gary. *The University in Dissent: Scholarship in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150 pp. ISBN 978-0-415-68115-5.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拓展了Bill Readings在《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书中的观点，对世界各地高等教育日益增加的公司化进行了哲学讨论。

Schloss, Partrick J., and Kristina M. Cragg, eds.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305 pp. ISBN 978-0-415-89270-4.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聚焦美国，收录了管理人员的文章，讨论了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问题。包括认证和评估的行政管理、学术带头人的绩效期望、学生治理、人力资源战略、课程问题和资源，以及慈善等。

Smelser, Neil J. *Dynamics of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Growth, Accretion,*

and Conflic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139 pp. ISBN 978-0-520-27581-2. Web site: www.ucpress.edu.

本书是2012年Clark Kerr的演讲集,讨论了一系列当前高等教育十分重要的问题,包括收入和支出、学术院系的稳定性、大学功能的增加、日益增加的商业化,以及在线和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增加等。尽管该书的焦点是美国高等教育,但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

Sovic, Silvia, and Margo Blythman, e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gotiating Higher Educ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3. 243 pp. ISBN 978-0-415-61470-2.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分析了与学生留学相关的问题,包括政策问题和挑战相关的特殊话题。涉及的主体包括大学对服务国际学生的道德承诺、国际化的课程、艺术和商业领域国际学生的案例研究,一些章节关注了国际学生相关的语言问题。

Vukasović, Martina, Peter Maassen, Monika Nerland, Rómulo Pinhwieo, Bjørn Stensaker, and Agnete Vabø, eds. *Eff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Change Dynamics*.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12. 311 pp (pb). ISBN 978-94-6029-014-9.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本书收录了一系列有关不同国家和地区学术变革的研究论文。涉及的话题包括美国的学生经济资助、欧洲质量保障体制的发展、欧洲的研究流动性、非洲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以及一系列学术职业研究。

Wang, Qi, Ying Cheng, and Nian Cai Liu, eds.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a Shared Goal*.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13. 226 pp. ISBN 978-9462-09-032-3.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本书的焦点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不同战略。书中收录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荷兰、丹麦和台湾的案例研究。书中广泛分析了排名的角色、研究型大学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顶尖研究人员的角色等。

